

当代媒体表征中的社会主义时代

2002年在斯大林学会上的演讲

文|Harry Powel

译|红色文献翻译

(作者是英国马列毛主义组织革命实践的领导人)

BBC 第三电台经常会炮制一些反苏宣传来轰炸听众。每次有苏联作曲家，例如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播放，播音员就会强调斯大林时代的生活是如何的“恐怖”。其他大众媒体也不例外。例如，第五频道最近播出的一个关于 T34 坦克的节目提到：在二战爆发前斯大林杀害了三分之二的苏联农民。但是这个节目没有解释，这如果是真的，苏联是如何抵御纳粹侵略的。这里，我们需要仔细考察一下这种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舆论攻势的政治意义和以往的效果。

公众历史认识的来源

我们**现在**的行为受到我们对**过去**的了解的影响。例如，我们对新工党政府的态度，既受其在公开媒体上发布的声明和政策宣传的影响，也会和我们印象里工党和工党政府以往的履历有关。这些印象的一部分可能来自我们以往和工党的**直接**接触；但是其中很多印象，对年青人来说可能是绝大多数的印象，其实来自**间接**经验，来自其他人对此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叙述。事实上这不仅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来源，也是我们对当代的认识来源，例如巴以冲突。不过显而易见的，在当代，我们可以选择绕过各种间接渠道，直接在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上获取直接经验；而对过去的认识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目前，第一波社会主义浪潮已经过去，其成果被复辟的资本主义所取代。因此，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转述的材料，而非斗争亲历者的直接经验。这发生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一代身上。于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念通常都是负面的。典型的观念，例如：虽然社会主义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在实践后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想了解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就需要克服这种障碍。而我们只有克服这种障碍并且说服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变革可以带来非常积极的一面，并且在很长时期，这积极的一面是主要方面，才有可能成功重建革命运动。因此，我们需要来考察**大众历史认识**的日常来源。

除了亲历者的直接经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有许多来源。亲历者面对面的讲述，口耳相传的历史共识，在校学习，阅读历史书和文献。在当代英国，很少人有长期的参与革命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里生活的直接经验。一些人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度过假或者出差，但是短期的接触通常只带来各种直观感受，而很难形成深入的概念性的认识。有一小部分人有机会通过家庭成员来接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历史，并由此对社会主义斗争有一些正面的认识；不过通常，这类渠道带来的认识是负面的。而学校教育通常会轻视历史认识，其教学方式也不严谨。到目前为止，学校教育里提供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通常会具有负面形象。例如，大学历史教育里广泛采用的二战历史会将苏联和纳粹德国做比较，并且着重强调二者的相同点。不过无论如何，至少多数人在“学到”这些认识后唯一在乎的只是怎么把它们运用在历史考卷里。而严肃的历史学研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如何，受众通常很窄；虽然这里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安东尼·比弗的《保卫斯大林格勒》。

更重要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大众历史认识的来源，则是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所谓的自传、传记和小说，也包括报纸、杂志、电影、电台和电视节目。据调查，平均来说我们在睡眠以外的时间中大概有四分之一被这些大众媒介所占据。单从时间上几乎就可以认为，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或者说关于任何领域的，大众历史认识的最主要来源。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察这些媒介的，通常是负面的，历史表述的性质，然后才有可能找到消除其负面影响的办法。

实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本自传在英国卖出了数百万册，它就是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作者的父母是曾经遭受过严厉批判的中共党员。该书用虚假的女权主义的方式掩饰主题，坚定不移的负面描述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它特别吸引了女性读者，并且几乎是多数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的唯一长篇读物。很多读者把这本书看作是亲历者的客观描述，并且认为通过阅读这本书得到了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可靠的认识。这书的出版大获成功，并且影响了新一代的中国女性作家。

另一个成功的出版案例是路易斯·德·伯尔涅斯的《柯莱利上尉的曼陀林》，销量超过一百万册。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希腊的塞佛伦尼亚岛。在这本小说里，共产党领导的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似乎只是由一群醉鬼和凶残的盗贼组成的。而事实上，他/她们勇敢地与德国占领军做斗争，并最终成功的通过武装斗争把占领军赶出希腊。然而，这个小说的众多读者对二战时希腊的历史的认识，不会包括这些史实。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关于该书的文学讨论会，参与者里的大多数人都对质疑该书的历史真实性的做法很反感，因为他们需要沉湎于该书塑造的文学氛围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反动的作品可以在艺术上非常吸引人，也因而更具有危害性。

幸运的是，在这个例子里，书中的观点受到了公开的质疑。在 2000 年，好莱坞将该书改编成电影，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并在岛上完成拍摄。当地人对该书作者编造的诋毁义愤填膺并公开抗议。抗议的参与者中有一位年长的意大利军官，他几乎可以充当柯莱利上尉的人物原形：在二战初他为意大利法西斯作战，当意大利投降他则选择加入了 ELAS 来与德国作战。

电影的制片人发现抗议可能蔓延到全希腊，于是赶紧派人修改台词，删除了对 ELAS 的负面描述。《卫报》详细报道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而 BBC 则出了一档节目：真实的柯莱利上尉。这个例子罕见的说明，公众可以采取行动来成功纠正媒体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斗争的错误描述。然而，当地人的个人经历和口传的历史是人们反对德·伯尔涅斯的反动小说的事实基础；而通常很难找到这种事实基础。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接连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并在西方国家出版。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许多左翼人士受到索尔仁尼琴的吸引，而其中一些人，例如格奥尔格·卢卡奇，甚至将他的小说赞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复兴。然而后来的事情说明，索尔仁尼琴及其同好想要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新生，而是加速它的解体。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一些类似题材的惊险小说，其作者包括美国作家马丁·克鲁兹·史

密斯。他设计的英雄人物，阿卡迪·兰科(Arkady Renko)，是一个国家调查员，活跃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和九十年代，而不被当时腐化的苏联官僚及其后继者们所接受。他的小说包括：《红场》和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高尔基公园惨案》。阿卡迪的父亲被设计为一个曾经被称为“斯大林之剑”的退休的将军，曾经主持过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并因此被他的儿子厌恶。这类题材的另一个例子是《大天使》，其作者罗伯特·哈里斯是彼得·曼德尔森的朋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为斯大林设计了一个秘密出生并被当作继承人培养的儿子。虽然这个设定非常荒诞，却也能卖出十万册的销量。



这就是斯大林对你的资产阶级话语的看法。

在冷战期间反苏题材的电影，尤其是产自好莱坞的电影，大量出现。其中的一些，即便题材反动，仍然具有娱乐性甚至是艺术性。例如，由理查德·康顿(Richard Condon)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谍网迷魂》。这些电影出现在冷战时期尚且可以理解，而它们则继续持续到冷战后的现象就值得我们关注了。例如最近的一部电影：《兵临城下》。这个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在现实里的原形是：由裘德·洛(Jude Law)主演的王牌狙击手瓦西里·柴瑟夫(Vasily Zaitsev)；一个年仅十五岁的鞋匠萨莎(Sasha)，因为监视德国人的行踪而付出了生命。这部电影试图让观众相信，整个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一个貌似高手的德国狙击手能否解决瓦西里。电影里对“狙击手”的推崇也许可以勉强看作带有艺术性的夸张，但是时常添加的反苏桥段则不然。

另一个由朗·普尔曼(Ron Perlman)扮演的狙击手被设计为在苏德协定期间在德受训并因此在回国时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处置。电影里将围城期间的士兵与市民的生活处理为生活在地下空间里，这很符合历史。但是在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作为政委被斯大林下派到前线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生活办公的地方有宫殿似的装饰，并且堆满了食物和酒。这种差别显然是用于突出苏联官民生活条件的天壤之别。女主角是个爱上了狙击手瓦西里的犹太裔学生；这位角色在一个场景里提到她父亲的一个说法：犹太人在苏联仍然受到压迫，只有建立自己的祖国才能获得自由。这部电影包含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说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二战的转折点；另一方面，领导苏联获得这一胜利的政权却是彻底腐朽的。不过，和另一部由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主演，却因为诋毁过头而无法公映的“欧洲最贵”的传记电影《斯大林》相比，《兵临城下》至少在艺术性上稍胜一筹。



《兵临城下》的剧照

如前所述，BBC 第三电台在过去很多年里一直在针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做负面宣传。每当播放苏联作曲家如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的作品时，总会在开头介绍部分或者在中间插入一段反苏宣传。通常，这些宣传的问题不仅在于对历史事件的解读角度，而在于歪曲了史实。例如，主持人不止一次曾经提到，斯大林曾经强迫肖斯塔科维奇加入苏共。而事实是，这位作曲家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被迫入党的。在这些事情上，由所罗门·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编纂的，不甚可靠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经常被用作可靠性毋庸置疑的八卦来源。

在播放中途的插入评论有时会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曲解到滑稽的程度。例如，他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的创作意图是以自然的方式来让听者体会到苏联人民对纳粹侵略者的反抗。然而 BBC 第三电台的播音员则多次强调，这个交响曲的“真实”意图是用于表达创作者自己在斯大林这个暴君统治下的痛苦感受。有些评论者则声称，他在乐谱里发现了作家留下的密码。按照这个趋势，普罗科菲耶夫的《彼得与狼》恐怕很快会被解读成是在批评斯大林的狼子野心。

不过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例子里，这位作曲家在苏联的处境确实不顺利，而他的作品也经常能体现出这种感受与他对苏联人民的感情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即便是与苏联政府关系良好的作曲家，例如普罗科菲耶夫，BBC 第三电台也不会放过。BBC 第三电台在节目里时常提到，普罗科菲耶夫之所以在三十年代返回苏联是因为他在西方国家的事业逐渐走向低谷。但是 BBC 第三电台回避了这样一个情况，普罗科菲耶夫在 1937 年创作的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合唱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热诚，而这部作品在他有生之年并未公演。此外，对于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理念的作曲家，例如阿拉姆·哈恰图良(Aram Khachaturian)，即便创作的作品在群众中广为流传，BBC 第三电台在节目中却始终暗示说这些作品有天生的缺陷。BBC 第三电台总是回避这样一个对比：苏联时期硕果累累的音乐文化在解体之后一蹶不振。

在电视节目方面，传达针对社会主义时代的负面印象的主力是历史题材的记录片。例如，关于苏联的纪录片主要围绕二战时期，并且总是使用这样的剧本：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把苏联经济搞的一团糟，使得在面对纳粹入侵时苏联士兵也缺少现代武器；而苏联则无需斯大林的灾难性的统治也能赢得二战。而事实上，正是在斯大林推动下苏联人民拼命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苏联军队及时提供了应付纳粹进攻所需要的现代装备。

而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则主要围绕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以及毛泽东在这些运动中的角色。

毛泽东始终被他们描述为一个执着于权力的疯子。其中的一些例子对从一战到 1949 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段历史的描述还算有理有据，但是似乎建国之后事情就一路急转直下，直到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领导的反革命为止。

这些纪录片总是在回避社会主义时代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发生的巨大转变，例如在生活水平、群众教育、妇女解放、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显著成就。相反，群众总是被描绘成缺乏主动性与创造力，只会盲目的跟从党的领导的人。这些“纪录片”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它们的观众面比虚构情节的电影更窄，但是借着“纪录片”的名头，它们通常被更多人认为在史实上比较可靠。

理论阐释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通常并不需要通过直接使用强制力量来维持资本的统治，而是可以通过他们的思想意识，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时刻影响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指出的那样，有许多种方式维持这种**意识形态霸权 (ideological hegemony)**。宗教、教育、艺术、文学、日常流行文化甚至语言本身都是使群众处于**虚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 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媒体**是实现这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指出，媒体在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作用上已取代了宗教。



安东尼奥·葛兰西

当然，人民并不完全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因为人们会在日常生活的实践经验里产生与之相反的观点。这种日常经验正是人们有意识地反抗资本主义的根基，也能催促人们去寻找更好的替代物。具体到当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具体的组织形式：政党和工会组织等逐渐退潮后，在当代的日常政治斗争里得到的、不够清晰和有条理的概念，会因为缺少这些正式的组织结构，而无法发展为内容自洽的革命理

论，因而也就无法用于指导革命实践。

如果回顾上世纪中叶的英国，我们可以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中间阶层自称“社会主义者”。他/她们中的多数人对这个标签的并没有详尽的概念，但是他/她们很清楚基本观点：两极分化的社会是错的，显著的不平等没有借口可以洗地，生产资料的公有是消除这些分化的方法，等等。这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或多或少有一些认同感。当代的情况则相反，很少人会自称“社会主义者”或者对社会主义方面的观念有什么正面看法，甚至可能对社会主义的概念一无所知。

多数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多或少有些不满。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所需的不足相对缓和了，而生活质量的缺陷较为突出。此时，人民需要的是一套革命政治理论来方便的将政治上的不满来有意识的、清晰的表述出来。由于此前提到的接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困难，一些人转向环保主义，这本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怀疑论。而对大众来说，普遍的态度是“务实的妥协”，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有明确的批评，但是找不到可行的方法来改变处境。要改变这种被动妥协的普遍状态，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是挑战当前寄生在大众日常历史认识领域里的众多反社会主义概念。

讨论

下列讨论的中心是如何对抗当代的公众历史认识领域常见的、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负面概念。

创作正面描述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包括历史作品和虚构的文学作品等。创作成果可能难于分发，但是漏洞总会有的。一些出版商不会反对出版能引发争议的书，因为争议可以带来销量。

写信正面回应报纸和杂志出版的反共材料。

在电台和电视台对社会主义做歪曲宣传时，打电话回应。

利用新兴的媒体技术来自制电影、视频和录音。当代有一些非主流的渠道可用于发行这些材料。

英国普通初级中学毕业文凭(GCSE)和通用教育证书(GCE)的教学大纲里包括一些反共作品。这些材料配有一些学习笔记；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采取不同视角的版本供学生选择。

在放映反苏电影的影院门口散发针对性的宣传册。几年前，斯大林学会制作了一些针对约瑟夫·维尔斯麦尔(Joseph Vilsmaier)拍摄的德国电影《决战斯大林格勒》的宣传册，并在诺丁汉地区放映该电影的艺术电影院门口散发，使得影院方面事后修改了节目说明。

后记

我们发现这次报告的听众里好像有一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6月10日的《新政客》刊登了一篇乔安·哈里(Johann Hari)写的关于这次斯大林学会会议的毁谤性质的文章。(该文被

《卫报》于6月22日转载，题为“镰刀社：不列颠最后的斯大林主义者在捍卫约瑟夫叔叔”，配图包括二张斯大林同志的照片！)。这位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搞错了一些事实：这次会议开在下午不是早上；斯大林学会建立于1990年而不是1930年；引用发言错漏，等等。)

哈里特意强调了，这次会议的一些参与者“老朽不堪”。新工党的政客们公开声明：老人是社会的不应承受之重。大概很快就会有什么政策智库提出方案来鼓励安乐死，例如用提前支付的额外退休金来协议定期处死。此外，该作者还用自已的报告来附和对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和托尼·本(Tony Benn)的批评。但是《新政客》的前任编辑，史蒂夫·普拉特(Steve Platt)，在一周后指出哈里误引了斯卡吉尔的发言。哈里引用的文字是：“我已经受够了今天的所谓‘专家’对苏联，尤其是对斯大林的批评。”而斯卡吉尔的原话则是：“我已经受够了今天的所谓‘专家’对苏联及其领导层——主要是斯大林的这种批评：在1939年时苏联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资源和军事力量来承受或阻止纳粹的侵略战争。”

《新政客》似乎就此对斯大林的话题着迷了。一周后(6月17日)的社论题为《斯大林在学校》来评论英国的教育系统：“整个教育系统如今都建立在斯大林和毛的五年计划的基础上。”

Harry Powell, 2002年9月。

附言

斯大林学会的秘书曾经接触演讲者，希望将演讲内容制作成宣传册公开发售。幸运的是，这一尝试提高了斯大林学会的知名度。通常，学会在这类事情上的做法是：汇总演讲的文本，制作成宣传册——演讲者照做了；然后宣传册会加入一份作品清单，发送给成员——这时演讲者却接到了一份通知。秘书在通知中说，这份宣传册不会进一步发售，因为，“你在演讲中提到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的一些看法，斯大林学会决定不支持这些观点”。猜想一下，这个声明可能是指“直到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领导的反革命为止”。斯大林学会在中国革命的事情上并没有声明过正式的立场。实际情况可能是，提示中国存在反革命现象，这种做法冒犯到了实际控制学会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的一些成员。然而，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决定接受资本家成为党员，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又一次伟大进步。

(全文完)